

# 英格尔哈特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 及其现实意义探究

王天楠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8)

**摘要:** 英格尔哈特在探讨发达工业社会文化转型问题时提出了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用以说明政治文化转型的路径与方式。他用资源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论证代际价值观转变的条件,同时对该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模型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对相关理论提出的挑战作出了回应。这一理论开始以西方后来扩展到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为背景,因而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文化变迁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英格尔哈特;代际价值观;政治文化;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 D0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699(2014)01-0060-07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是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对欧洲以及世界上一大批国家政治文化演变进行了长期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该理论认为代际人口更替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或后现代价值观、自我表现的价值观等)转型的主要方式和途径。这一理论为人们深入研究政治文化观念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维度,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及其观念变革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 一、代际价值观转变的理论前提

所谓“代际价值观”,是指不同时代或代际的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而“代际价值观转变”则是指不同代际的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的变革,其一般规律是:持有旧价值观的一代人逝去,持有新价值观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伴随人口的代际更迭,社会整体价值观发生由旧到新的变迁。

英格尔哈特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人类发展时序》等著作,系统阐述了代际价值观转变的一般模式及

理论假设。他用两个假设来论证价值观代际变迁的条件,这两个假设是:

资源匮乏假设(scarcity hypothesis):“个人的优先价值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环境,即人们总是会在主观上最看重相对稀缺的事物。”社会化假设(socialization hypothesis):“社会经济环境和优先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及时调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会有一个较长的滞后,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未成年阶段的主流环境。”<sup>[1]68</sup>

通过英格尔哈特的上述假设,可以看到代际价值观转变所包含的理论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代际价值观转变的社会基础——优先价值观。英格尔哈特认为,一定时期存在某种优先价值观,这是由于资源匮乏决定的。当一个社会出现某种需求匮乏时,人们会给予它最高关注,从而形成优先价值观。在前工业化社会,由于资源匮乏、安全没有保障,人们的优先价值观是寻求生存和安全;在工业化社会,人们急迫寻求利益最大化,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质主义成为优先价值观;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享受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福利政策之后,优先价值观转向追求对个人主观幸福的后物质主义上来。随着政

收稿日期:2013-08-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1BZZ011)。

作者简介:王天楠(1977-),男,吉林吉林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学理论研究。

治、经济及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不同时代的人会形成不同的优先价值观,并由此构成代际价值观转变的社会基础。

第二,代际价值观转变的生理规律。英格尔哈特抓住了个人价值观形成的生理特点,以此论证代际价值观差异的规律。他用社会化原理说明个人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心理成熟过程,遵循着心理、性格形成的特殊规律。在这一规律中,存在一个生理关键期,始于儿童终于成年,个人在这个时期经历的外界环境对性格、心理、价值观乃至文化的形成意义重大。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具有多姿多彩的本能倾向,其基本过程取决于儿童的早期经验。”<sup>[2]405</sup>而“儿童是成人心理之父”<sup>[2]568</sup>。英格尔哈特认为:“在文化中比较核心的和较早习得的部分是不容易改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改变一个成年人的认知体系的核心部分是非常难的,而另一个原因在于放弃核心的信仰意味着产生不确定和焦虑,面对社会经济情况的不断转变,即便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可能被转变的,但是转变最可能的情况是通过代际人口更替,而不是通过外力改造已经社会化的成年人。”<sup>[3]12</sup>因此,未成年阶段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奠定了人一生的政治取向,形成了每一代人不同的政治文化特点。

第三,代际价值观转变的理论模型。英格尔哈特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和经济学的边际效益递减理论(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解释优先价值观的转变。需求层次理论说明了人类需求由低到高像阶梯一样按层次逐级递升的情况,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低层次需求实现后,上升为高层次的需求。边际递减效应则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地等量增加,增加到一定产值后,所提供的产品的增量或价值就会下降,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或价值会递减。英格尔哈特结合这两种理论提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迫切的需求,从而形成优先价值观,这种优先价值观又随着需求的满足而不断转换。根据边际递减原则,当某种需求充分满足后,再进行投入时其价值并不会因为投入而增加,反而会降低,新的需求则会提上日程,从而出现某种新的优先价值观。

第四,外部环境变化与价值观形成特点的共同作用。需求层次理论反映的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外部发展水平,而价值观反映的则是个人主

观方面,是构成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两者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价值观的形成遵循自身规律,它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虽然社会化是伴随人一生的过程,但一个人成年之前的环境、经历对其价值观的形成以及政治文化的塑造起到关键作用;而成年后,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变化甚少,即形成个人价值观的路径依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外部环境日益变化,人们的成长环境也发生相应变化,这就形成了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与个人的价值观路径依赖之间的差异。每一代人在形成价值观的未成年期受当时外部环境的影响,形成反映当时环境下的拥有这一代人特色的代际文化群体。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拥有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价值观的人,这便形成了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对于个人来说,价值观形成后相对稳定,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伴随代际人口的更替,整体价值观会发生变化,政治文化即实现变迁。

## 二、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特征

英格尔哈特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是一种解释价值观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理论模型。在他看来,代际价值观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在实践中受到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影响的长期复杂过程。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主要有以下特征。

首先,该理论打破了传统的横向价值观分类方式,提出了以人口的代际为标准的纵向分类模式。人们以往对价值观进行分类,首先会划出一个横断面,再依据阶级利益、社会地位、地域差异与宗教信仰等方面对价值观进行横向切割。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则根据价值观的形成特点,按照代际对价值观进行纵向分类。横向分类把人固定在一定圈子中,政治文化结构僵硬刻板,文化的整体变迁需伴随剧烈的社会变革,往往会以“革命”的方式完成,革命后统治者再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完成价值观的重建。然而,纵向的代际分类诠释的则是一场静悄悄的价值观革命。英格尔哈特在分析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过程时写道:“在战后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背景下,一些理论认为正在出现由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转型。在个人层面,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优先价值观出现了规模巨大、持续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则反映两者早期不同的生活经验;而在社会层面,只有一代人代替另一代人时,价值观的转型才逐渐显现出来。”<sup>[4]</sup>该理论抓住了价值

观形成的特点,把价值观的转型归结为人口更替而带来的新旧价值观人口比例的此消彼长。

其次,该理论建立在科学主义基础上,通过实证的、科学的研究方法验证代际价值观转变的过程。英格尔哈特1977年出版的《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主要依赖对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这六个国家的调查。1990年出版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是以对西方二十多个发达工业国家的价值观念调查为基础。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有着更大范围的样本国家,共计43个国家,覆盖了世界70%的人口。英格尔哈特与维尔泽(Christian Welzel)2005年合作出版的《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人类发展时序》则是以4次世界价值观念调查的数据为基础,涵盖了8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世界上85%的人口<sup>①</sup>。英格尔哈特在研究过程中,采取问卷调查、计量方法、数量运算、逻辑分析等手段,在对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又采用统计学方法把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得出的结论转化为数据,再对数据进行分类,进而归纳出有意义的结论。显然,他的研究与当代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潮流相适应。

最后,该理论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价值观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缩影,也是政治、经济变革链条上的一环,政治、经济的发展会带动价值观的变迁。英格尔哈特提出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所要论证的是发达工业社会在经历长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们享受社会福利之后,政治文化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化,这种转化也是发达工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反映。英格尔哈特颠覆了现代化线性发展理论,认为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非线性特征。他论述道:“这些变化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并不像卡尔·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所宣扬的决定性法则。更何况,文化转变是非线性的,并非直到历史终结始终朝着经济发展一个方向发展。相反,工业化带来从传统到世俗-理性价值的转换;然而,伴随着后工业化的兴起,文化转换开始向另一个方向移动。”<sup>[5]20</sup>这种价值观的非线性发展不但表现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之后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且还表现在发达国家经历经济危机、恐怖袭击、外部因素影响之后出现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或前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回潮。

但是,从长期发展趋势看,代际价值观的变迁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整体变化的方向。他在对世界价值观调查表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第一,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转型并不仅仅是西方的现象。第二,哪里发生价值观变化,哪里的代际差异越显著。”<sup>[6]</sup>

### 三、英格尔哈特面临的挑战与作出的回应

英格尔哈特提出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后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与质疑,这些挑战与质疑显露出该理论的某些不成熟,英格尔哈特在回应挑战与质疑时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

首先,对现代化的复杂性和代际价值观转变缓慢性的挑战。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以现代化发展进程为背景。虽然现代化理论反映的是人类的进步,但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达工业社会周期性地面临经济危机威胁,不时出现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从亚洲金融风暴到美国次贷危机,再到希腊等南欧国家的经济危机,发达工业社会周期性地遭受经济危机打击。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随时会因为重大的外部变故而出现物质主义或前物质主义的回潮,这就使得整个价值观体系呈现出复杂的情形。面对复杂的现代化情形,英格尔哈特和维尔泽在《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人类发展时序》中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四个方面的修正:第一,现代化不是线性的,它不是沿着同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的;第二,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反映了现代化的驱动力与维持传统的影响力之间的互动;第三,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第四,现代化并不会自动产生民主,但是从长期角度看,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将使民主化的可能性增加。另外,代际价值观转变也是缓慢的,艾布拉姆森和英格尔哈特撰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基本因素影响其缓慢性:“第一,在发达工业社会,人口更替本身是逐渐的,因为他们有相对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第二,虽然在政治价值观上有一个强烈的和持续的年龄群体差异,但所有西欧人都一定程度上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sup>[7]</sup>这些都对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对此,英格尔哈特进行了长期追踪研究,他对

<sup>①</sup>英格尔哈特从1988年至今担任世界价值观念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项目的联合会主席,世界价值观念调查目前已经涵盖了97个国家和地区,覆盖90%左右的世界人口,是当前全球最有影响的调查项目。该调查每五年发布一次调查结果,自1981年起已发布五次,调查结果已经为国际学术界所普遍认可(<http://www.wvsevsdb.com/wvs/WVSIIntegratedEVSWS.jsp?Idioma=D>)。

九个西方国家从1970~2000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化进行调查,“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9个西方国家,物质主义远远超过后物质主义……在1970年过后的30年,主要的变化发生了,在1999年到2001年的调查中,持后物质主义的人数在所有九个国家已经超过物质主义人数”<sup>[5]103</sup>。由此可见,从长期发展趋势看,代际价值观转变正在静悄悄地发生。

其次,群体效应、阶段效应与生命周期效应之间的矛盾性质疑。英格尔哈特在论述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时提到了与此相关的三个理论模型,即群体效应、阶段效应和生命周期效应。群体效应是指某一群体的价值观在成长期受主要生存条件影响,阶段效应指价值观形成受社会经济环境的短期波动影响,生命周期效应指人的价值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变化。其中,群体效应反映了社会经济长期变化对群体成长的影响,这构成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基础。因为未成年时期形成的优先价值观塑造了人们的文化倾向,这种文化倾向植根到人们的头脑中,成为这代群体的集体文化记忆。阶段效应反映的是社会短期波动形成的外部环境变化,它是对代际价值观转变的挑战。但是,英格尔哈特根据欧共体对西欧八国价值观的调查<sup>①</sup>得出结论:“短期的变化条件不能阻碍已经发生的长期变化。事实上,即使有一年接着一年的波动,西欧人的整体价值观分配仍然受代际更替影响。”<sup>[8]</sup>可见,短期波动是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变迁中的小插曲,它无法改变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也无法改变代际群体间的价值观差异。前两种模型从社会层面解释外部环境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生命周期效应从个人层面对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提出挑战。英格尔哈特在《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中对1970~1976年不同年龄群体优先价值观进行考察,回应了生命周期效应的挑战:“当我们根据出生日期做出回答而不是根据固定的年龄做出判断时,最大的鸿沟(13个百分点以上)出现在1945年或更早出生的人和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之间。这个分水岭是由于时代的变化而不是生命周期效应。”<sup>[9]</sup>生命周期效应也属于短期的阶段效应,只不过这种阶段效应不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引起,而是由于个人年龄变化引起,也是叠加在长期的群体效应之上的。英格尔哈特认为:“当短期的

力量回到正常时,一个重大的向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转型明显地显现出来,这大部分归因于代际人口更替。”<sup>[4]</sup>因此,表现长期社会过程的群体效应消解了短期震荡而形成的阶段效应和生命周期效应的影响,优先价值目标深入地植根于成年人口之中,能够使人们安然度过因政治经济动荡所造成的阶段效应影响和年龄变化而引起的生命周期效应的影响。

再次,纵向更替与横向差异的矛盾。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以不同代际人们政治倾向的差异为维度,把代际人口的自然代谢作为价值观转型的途径,这一理论的前提是把一代人作为同一价值群体,假定同一时期成长起来的群体具有相同的政治价值倾向。实际上,在同一社会背景成长起来的人,个人成长的微观环境又有极大差别,表现为个体价值观的差异。这就形成了纵向更替与横向差异的矛盾。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假定了统一的社会大环境,探讨社会整体政治价值观的变迁过程,而没能深入探讨每一代人政治价值观的横向差异,没能深入研究亚文化对整体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社会内部也存在地区、宗教、阶层、性别、职业等不同的“亚文化”群体,这些亚文化群体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取向;特别悬殊的微观环境甚至会消解社会大环境对个人政治价值观形成的影响,进而横向的亚文化差异甚至会替代代际价值观差异而成为政治文化差异的主要方面。然而,横向差异会随着发达工业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缩小:高等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们知识文化水平的同时,减少了狭隘区域、宗教、性别意识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政策消除了人们因为贫困、落后对生存与安全的担忧;市场经济和选举权的普及缩小了地区、城乡间的差异和这些差异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水平减少了横向差异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社会的发展带来整体价值观的变化。英格尔哈特认为:“这种变化着的价值观正重新塑造宗教信仰、工作动机、生育率、性别角色和性道德,并带来对民主制度和更负责的精英行为的大量需求。”<sup>[5]125</sup>另外,现代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朝向同一方向而不是汇聚一点,他们看起来由文化遗产塑造,却按照相似轨迹发展。我们可以怀疑,现代化的力量在可

①这项调查由欧共体发起,对1970~1990年西德、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1973~1990年丹麦、冰岛等八个欧洲国家的价值观进行调查(转引自Paul R. Abramson, Ronald Inglehart,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and value change in eight west European societies*[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2, 22(2), p183-228)。

以预见的未来将造就一个同质的世界”<sup>[10]</sup>。因此,社会的整体进步将抹平微观个体的文化差异,在发达工业社会,整体的政治价值观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型。

第四,首因模式与近因模式的矛盾。所谓首因模式(the primacy model)是指个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通过最先输入的信息对客体以后的认知产生的影响作用。所谓近因模式(recency model)是指当人们识记一系列事物时对最近部分项目的记忆效果优于之前部分项目的现象。这两种模式都会在政治社会化中发生作用,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学习政治与了解政治的过程,也是政治文化得以实现代际传递的途径。如西方学者指出的:“社会化的主要方面包括:人们学习什么(内容),什么时候学(时机和次序),以及从哪里学(施动者)。政治社会化的大多数研究都源自于首因模式(the primacy model),即假设我们年幼时所习得的东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以了解后来经历的棱镜。”<sup>[11]</sup>英格尔哈特在用社会化假设论证代际价值观转变时运用了首因模式理论。他认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最普遍的概念,就是人的基本性格结构。它认为一个人在成年时才明确定型的性格特征一般在成年后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一概念在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的相关著作中都有论述并沿用了当代调查研究的发现中。早期的社会化经历似乎要比后期的社会化经历重要。”<sup>[1]68-69</sup>首因模式理论强调人们基本的政治价值观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孩提时代的社会化是一种“深度习得”,它为未来成年阶段再获得信息奠定基础。与首因模式相对的理论是近因模式,该理论强调现实信息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如何解决首因模式和近因模式的关系是发达工业社会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型论证成立的需要,也是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逻辑自洽的需要。一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因为政治经济制度成熟、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首因模式已经确立了人们对当前制度解决突如其来的问题、化解各种危机的信心,人们用首因获得的政治态度与倾向观察近因造成的外部环境的变故,总体的政治态度与价值观不会发生动摇。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我们这个时代,突如其来的危机已经变成了特例,虽然这类事件不断发生,但很快成为过去,它们都可以通过而不是绕过既已确立的视角去加以观察。总之,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的长期稳定、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完善的社会福利已经储存了人们克服近因危

机的信心,而首因模式所储存的价值能量足以克服近因模式所造成的文化基因突变的威胁。

#### 四、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代际价值观转变是英格尔哈特在研究发达工业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其理论背景和论证数据以发达工业社会为主,后扩展到世界范围。这一理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文化变迁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该理论对分析当代中国的价值观转型、推动社会民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们从意识形态压力和计划经济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同时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们生活水平和社会面貌出现巨大改观。“80后”的中国民众开始追求独立、自由、个性,并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生活,呈现出个人主义的倾向。英格尔哈特在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中对2005~2008年中国民众的自主性进行调查(见表1)。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公众最高自主性评分低于德国但与法国相近,这说明中国人在自主性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表1 2005~2008年中国民众自主性指数的得分分布<sup>[3]36</sup> 单位: %

自主性指数 (Autonomy Index)	国别		
	法国	中国	德国
最低的自主性得分	1.80	0.10	0.80
次低的自主性得分	18.70	5.20	4.60
中间值	31.60	29.20	17.20
次高的自主性得分	31.40	49.00	32.00
最高的自主性得分	16.50	16.50	45.40
总计	100	100	100

这种进步是以代际价值观转变方式完成的。市场经济改变了1978年后出生的一代人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在他们中间逐步培育出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公民文化。这一代人正逐渐代替计划经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而促进整个社会价值结构的变化,而自主性价值观的建立和公民文化的培养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该理论对于构建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具有指导意义。英格尔哈特根据代际价值观转变对现代化进行划分,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对文化变革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工业化引起了第一种主要的文化变革过程:带来了官僚化和世俗化。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导致了第二个主要文化

变革过程：代替理性、集中化和官僚化的是一种强调个人自治和自我表达价值的新趋势。”<sup>[5]25</sup> 第一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从传统权威 (traditional authority) 向世俗-理性权威 (secular-rational authority) 转变，第二阶段概括为从生存价值观 (survival values) 向幸福价值观 (well-being values) 转变。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中，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社会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出现了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并行的态势。英格尔哈特提到的两种价值观转型在中国同时出现，一方面公众从传统权威向理性的法治权威价值观转变，另一方面公众价值观由对温饱的满足转向对和谐、幸福生活的追求。因此，国家应该因势利导，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教育，树立独立、自主、追求幸福的价值观，把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中的积极因素结合起来，使新一代树立新的风尚，通过代际人口更替逐步改变陈旧的价值观，确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体系。

再次，该理论对于了解中国价值观代际分布状况、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参考价值。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朝着全面小康的方向迅速迈进，在大城市，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开始促使一部分富有阶层开始关注个人的幸福感、自我表现以及生活质量等后物质主义问题。英格尔哈特在世界价值观念调查项目中设置了一个后物质主义指数，在 2006~2008 年的调查中发现，中国社会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开始发轫，随着年龄从高到低，中国民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比例增加，物质主义价值观比例减少，混合型的价值观仍占多数 (见表 2)。

表 2 2006~2008 年后物质主义在中国不同年龄组的分布<sup>[3]41</sup> 单位：%

后物质主义指数	年龄		
	15~29 岁	30~49 岁	50 岁以上
物质主义	35.20	48.30	54.70
混合	58.30	46.90	42.80
后物质主义	6.50	4.80	2.50
合计	100	100	100

利用代际价值转变理论分析中国社会价值结构，可以得出中国社会仍处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过渡的转型期，虽然物质主义价值观仍占主要比重，但从社会长期发展趋势看，中国社会正处在逐步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迁的过程中，上述分析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文化教育政策的调整具有参考价值。

最后，该理论对于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具有指导意义。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新旧文化与价值观相互碰撞，如何处理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价值观的关系至关重要。新生代不是洪水猛兽，旧传统不是固步自封，二者之间并非断裂而是继承发展、去伪存真、取长补短的关系，处理好不同代际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对于衔接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新生代的价值观转变不是横空出世，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都是建立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新生代的价值观总会或多或少带有老一代人价值观的影子。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要运用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充分吸收传统文化中有价值和意义的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前人建立的政治文明和有益价值观基础上构建新一代的价值观，从而既继承历史传统又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体系。

总之，英格尔哈特提出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解释发达工业社会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和政治文化变迁的理论模型，他通过对二战后几十个国家价值观变化的长期观察建立了价值观转化的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工业发达社会价值观转型的方式和途经。虽然英格尔哈特的理论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从长期发展趋势上看，其理论具有较大合理性与优势，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Ronald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读[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3] 英格尔哈特.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 严挺, 译.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4] Ronald Inglehart, Scott C Flanagan. Value change in industrial societie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7, 81(4): 1 289-1 319.

[5] Ronald Inglehart,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6] Ronald Inglehart, Paul R Abramson. Economic security and value change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 Review, 1994, 88(2): 336-354.
- [7] Paul R Abramson, Ronald Inglehart.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and the future of post-materialist value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87, 49(1): 231-241.
- [8] Paul R Abramson, Ronald Inglehart.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and value change in eight West European societies[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2, 22(2): 183-228.
- [9]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6.
- [10] Ronald Inglehart, Wayne E Baker.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65(1): 19-51.
- [11] 罗德·黑格, 马丁·哈洛普. 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M]. 张小劲, 丁韶彬, 李姿姿,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41.
- [责任编辑 彭国庆]

(上接第 59 页)

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生产效率的问题, 而是如何解决公平分配以及效率和分配之间的问题。我们应该在保障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的同时,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我们需要社会基本结构的转变, 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调节人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以实现分配的真正公平正义。

#### 参 考 文 献

- [1]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M]. 董果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2] 万俊人. 罗尔斯问题[J]. 求是学刊, 2007(1).
- [3] 赵敦华. 劳斯的《正义论》解说[M]. 香港: 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1988: 2.
- [4]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x1.
- [5] 李强. 自由主义[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59.
- [6] 洛克. 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 翟菊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16-17.
- [7] 姚大志. 何谓正义: 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其他[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1).
- [8]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9] 理查德·F·冯德勒. 罗尔斯与他的正义理论[J]. 李小科, 译. 开放时代, 2003(1).
- [10] 万俊人. 政治哲学的视野[M].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8.
- [责任编辑 勇 慧]